

工 作 方 法 研 究

著 川 小 郭

版 出 店 書 華 新 中 華

工作方 法研究

田 淵 著

東京大学出版会

工 作 方 法 研 究

郭 小 川 著

中 華 學 生 書 局 出 版

工 作 方 法 研 究

著 者 郭 小 川

出 版 者 華 中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者 華 中 新 華 書 店

• 一 九 五 〇 年 一 月 初 版 •

1—6000 (X)

基本定價

目次

前記		(一)
學習階級分析的方法		(三)
政策三題		(八)
駁強迫命令的藉口		(一五)
政策和羣衆見面		(二一)
略談具體領導		(二七)
說『轟轟烈烈』		(三一)
『敢於與善於提出問題』		(三五)
談羣衆意見		(四一)

比較法……………(四六)

開會問題……………(四九)

怎樣寫報告?……………(五三)

農村調查片談……………(六〇)

阿Q的盲目性……………(六五)

談經驗的運用……………(六九)

學習，才能前進……………(七三)

前記

這本小書所收集的，絕大部份是到武漢後所寫的短文，一部份是從前在實際工作的餘暇中寫的，又經過若干修改。寫這些東西的用意，主要是在接觸到一些工作情況之後，感到有些問題值得研究或值得提出，自己又有些零碎的意見，所以，就把它寫出來；有些則是在工作中摸索到一點經驗，一點心得，隨時記錄下來，經過整理，也算是一篇小文章，發表在報紙上，以為做共同工作的同志們的一點參攷，原來從沒有集成小書的意思。

小文章也可以積少成多，放在一起，也竟有好幾萬字，可以集成小書出版了，但這些不成器的，浮淺的東西，是否有什麼參考的價值，確是難說得很。不過，我自己却有一個願望，就是關於工作方法問題與工作作風問題，應該有個更為濃厚的研究空氣，蘇聯真理報上發表了很多關於工作方法等問題的論文，讀後受到很大裨益，在這一點上，我們也同樣應當效法，那怕像我們這些人，對這方面僅有個一知半解，自己的心得也是『浮泛之談』，然而當做『開步走』總也有好處的。那末，這點小東西，

權當做一堆『大文章的小題目』，讓它公諸讀者之前。

這裏所涉及的，主要是新區農村工作的若干零碎問題，有幾篇也談到一般的工作方法問題以及思想方法問題，總的說來，一般不外兩個問題，一是羣衆路線問題；一是經驗主義問題。其所以選取這兩個問題，自然是因爲感到在這兩個問題上，我們的工作中確有一些缺點，所以在討論中也就偏重在對缺點的指責。這裏，我就不能不有一個耽心的地方，就是：會不會因此造成讀者的一個錯覺——以爲我們的工作中缺點如此之多而且嚴重，以致使寫文章的人簡直無可表揚之處了呢？這，我希望是不會的，也相信是不會的。我們絕大多數幹部的刻苦樸素作風，我們工作中的有目共觀的成績，我們新國家中瀾漫在城市和鄉村中的欣欣向榮的氣象，以及在華中地區內日益發展着的、規模廣大的羣衆運動，都可以證明：我們工作的主要方面，不是缺點，而是優點和成績，正因爲如此，我們更要指責我們的缺點和錯誤，那是由於我們已經具有充分的條件來逐步克服這些缺點和錯誤。

最後，還要說一聲，書名『工作方法研究』是編者給加的，『研究』二字應該是指『研究』的嘗試，而不是『研究』的成品。其中錯誤與缺點在所難免，希讀者指正。

作者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

學習階級分析的方法

階級分析的方法，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與方法。生在階級社會而不承認階級的存在，那祇是舊統治階級的一種欺騙。但僅一般地承認階級的存在，而不會或不大會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來認識現實，從而改造現實，那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或者至少也不是健全的馬克思主義者。

在我們隊伍中，特別是工作幹部中，前一種情況，即不承認有階級存在的，基本上是沒有的，即使中過統治階級的毒、又參加工作不久的知識分子幹部，只要到尖銳的階級鬥爭場所的農村看一看，也就可以明白了。而後一種情況，即不會或不大會運用階級分析方法的，却仍然不少，甚至在一部份老幹部身上，也是若明若暗，模糊不清。

比方說，我們正在以剿匪反惡霸為中心工作，但什麼是「土匪」，什麼是「惡霸」呢？有些同志則模模糊糊地認為：「土匪」就是用武裝來搶劫殺戮民衆并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權的；「惡霸」呢，就是農村中橫行霸道，為非做歹的人物。而不能用

階級觀點加以分析，就是說，看不出它們的階級性，因此也就看不到它們的聯繫性與嚴重的危害性，當然也就無從找到對待它們的正確政策。因為，從上述認識出發，對於匪，就可能把它看成沒有社會基礎的孤立存在（當然這是不可理解的），當土匪猖獗時，則認為只要單純地派一支足以戰勝它的軍隊，就可以收平；當土匪潛伏分散了，表面上平靜無事了，又認為匪患已除，可以高枕無憂。這樣一旦土匪養好翅膀，轟然而起，必使工作遭受到更大的損失。對於惡霸，就很可能把真正惡霸，同在他們指使下的爪牙混同起來，沒有分別地加以打擊，而常常打不中敵人的要害，甚至放了賊首，擒了嘍囉，這樣就不僅不能分化敵人營壘，相反會在一定程度上強化敵人的陣線。如果把匪霸用階級觀點加以分析，就可以明白，所謂『惡霸』，就是地主階級在農村的當權派與首腦人物，就是地主階級中的最兇惡、最政治化的那一部份，一般地又是大地主，而那些為非做惡的流氓地痞及少數中貧農中的游離分子，則不過是他們的或大或小的爪牙而已（其本身已轉化地主階級的，又當別論）；所謂土匪，在目前就是惡霸的武裝，就是為地主階級當權派所掌握的武裝，即使不是他們所直接帶領，也是為他們所控制。因此，要肅清土匪就必須反霸，要反霸就必須首先剿匪，二者是一個問題的兩面。那末，很明顯，當惡霸乃至整個地主階級尚未消滅，就不能認為土匪已經絕跡（甚至在地主階級被消滅後的一定時期內，它的殘餘勢力也還有陰謀復辟的武裝叛亂的可能）；在我軍事打擊下，當股匪被消滅，散匪亦暫時表現沉寂時，就要

進一步肅清潛匪、收繳武器，發動羣衆進行反惡霸鬥爭，挖掉土匪的根子；而反惡霸的鬥爭對象，就應該主要放在惡霸身上，至於他們的爪牙，雖然在羣衆的要求之下也可予以政治上的打擊（罪大惡極而爲羣衆所痛恨者也可以鎮壓），但在方法上與對這些人的處理上，必須與惡霸有所分別，其目的則是在把他們從惡霸營壘中分化出來，并引導羣衆向惡霸鬥爭。

又例如，積極分子這一概念，在有些同志頭腦中，也同樣是模糊的。似乎只要在鬥爭中表現積極，就算積極分子，其階級性則可以不問。結果是狗腿，流氓，破產地主乘機混入，篡奪領導權，鬧假鬥爭，破壞運動，壓制羣衆，或者亂鬥一通，紊亂羣衆陣營。這方面，過去我們曾吃虧不少。要知道，所謂積極分子，在農村的羣衆運動中，就是貧僱中農、主要又是貧僱農中的先進分子，我們去找積極分子時，只有首先到貧僱農中去找，其次到中農中去找，因爲只有這些勞動人民，才能真正代表他們本階級的利益，才能夠真正起帶頭作用，也才具備培養成爲羣衆領袖的條件和可能。

還有一些本來就不是階級概念的名詞，也爲我們有些同志所承認、所運用的。例如所謂窮人，富人（老財，財主）等，窮人富人的劃分，自然反映了階級社會的剝削制度，但這種概念却是一種樸素的，並不完整的概括，而未能依靠人們對於生產資料的關係的不同，劃分各種不同的階級，它僅是着重生活狀況的差異，粗略地加以分別，顯然，這是不科學的，因此也是不完全正確的。但直到現在，因爲羣衆還這樣沿用

着，我們有些幹部也就跟着沿用起來，結果有時就不免因此造成錯誤。事情很清楚，窮人有各種各樣的窮人，富人有各種各樣的富人，流氓也是窮人，貧僱農也是窮人，二者却有基本的區別，如果把依靠貧僱農誤爲依靠流氓無產階級，那末，工作就斷然會失敗；地主、富農是富人，城市的民族資產階級也是富人，但前者是敵人，後者是朋友，敵友不分就會造成路線的錯誤；同時富裕中農在貧農看起來，也未必是窮人吧，因爲他們要比貧僱農的生活情況好得多，但他們決不是鬥爭對象，而是鞏固地團結的對象。因此，我認爲，我們在組織農民運動時，一開始就應該把階級劃分標準灌輸給羣衆，以劃清界線，避免混亂，這樣做，只有好處，毫無壞處。

再有一個含混的概念，就是佃農，某縣在進行重點村反霸鬥爭時，把佃農與貧農混爲一談，而不知道佃農中還有佃富、佃中、佃貧之分。佃農，這不是一個階級概念，雖然在受地主剝削這一點是共同的，而在其他剝削關係上還有着很大的差別，佃貧農還要出賣一部份勞動力，佃富農則還有僱傭剝削。自然，佃富農是否可以參加農民協會，仍值得我們研究，但如果把不同階級的佃農同等看待，採用相同的政策，顯然是不對的。

上面所舉的，祇是說明缺乏階級分析方法方法的幾個例證而已。階級分析的方法不僅在這些方面十分必需，而且應當應用這種方法於瞭解各種情況，決定與執行各種政策上面，就是說，用這種方法來認清革命鬥爭中各階級的面目，以及他們的要求、趨

向，又如何引導他們對革命工作發揮積極的作用。對於敵人，也同樣要認清他們的階級本質，進而採取堅決的、適當的方法，有步驟地有分別地對待他們，目的是澈底地消滅他們。

一九四九年八月漢口

政策三題

一，政策與『圈子』

在我們的隊伍裏，公開反對政策的作用的，可肯定說是沒有的，但在不同程度上忽視政策乃至敵視政策的情緒，在我們地區內，却實在是有。一部份同志中，存在着一個相當凝固的觀點：『政策就是圈子』，意思是：政策束縛了羣衆的手腳，限制了羣衆運動的發展，因此政策和放手是對立的，講政策就不能放手，要放手就不要講政策，這麼一個『邏輯』，便把政策輕輕勾銷了。

政策是什麼？黨的正確的政策，『是根據各階級在一定歷史階段中所處的不同地位，規定對於他們的不同待遇，適應廣大人民需要，指導人民行動的東西。』（周揚同志在文代大會上的報告）這就是說，政策是羣衆的根本利益出發，來指導羣衆行動的東西。在羣衆運動中，政策，乃是指針，乃是勝利的保證，乃是把羣衆的自發狀態中提高到自覺程度上的武器。

政策，對羣衆運動說來是不是『圈子』呢？那要看怎樣解釋，在一定意義上講，可說是的。首先它就『圈』住了那些脫離羣衆的個人冒險的行爲；其次，它不可避免的要『圈』住某些幹部的無政府無紀律的行動；再次它同樣要『圈』住那些散漫的、盲目的、自發的羣衆運動，使之不向失敗的道路發展，而把它引導到有組織的、有目的、有意識的道路上去。但是，它從來不會『圈』住真正的羣衆運動的健康發展。

只有沒有政策的羣衆運動，才會受到意想不到的束縛。凡是政策上犯錯誤或放棄了政策領導的地方，常常因為敵人鑽了許多空子來進行破壞；或者因為失去了廣泛的社會同情而陷於孤立；或因為羣衆中的內部糾紛對消了力量；或者因為這些方面的因素的總和，使羣衆顧慮、游移而縮手縮腳起來。這裏，政策並沒有『圈』住誰的行動，鬥爭却不免於失敗，而歷史上無數次的農民革命，也確實是沒有政策或者缺乏正確的政策來『圈』它們的，但結果怎樣呢？難道不是一一陷於失敗了嗎？今天，我們是幸運百倍的，我們有共產黨的正确領導，有各種正確政策的規定，因此才有了今天的偉大的勝利，這正是舊時代所夢想不到的事情，而今天却已成爲一切羣衆行動的根本規律。但是，有的同志却竟以爲是『圈子』，即使是『圈子』吧，只要這個『圈子』能夠使羣衆勝利，那末，我想，這個『圈子』才真是不可少的。

這就可以明白：政策和放手決不是矛盾的，只有有政策的放手，才能真正放開

手。沒有政策的放手，真正的羣衆運動反而常常起不來，即使起來，也不可避免地要犯錯誤。

二，政策怎樣產生的？

上面的話還不能完全說服一部份同志，他們會說：『但是呀，政策也是從羣衆中來的，毛主席不是說過：集中起來，堅持下去嗎？政策也是羣衆中集中起來。』所以，『結論』是：『羣衆的意見就是政策。』因此，『政策也就可有可無了。』

政策怎樣產生的？不錯，毛主席曾光輝地規定過『集中起來，堅持下去』的基本原則，政策確乎是從羣衆的根本利益出發，并把他們的意見、要求、鬥爭經驗和創造集中起來的，離開了羣衆利益，自然斷乎沒有正確的政策可言，而離開了羣衆的意見、要求、鬥爭經驗和創造，憑着個人的所謂天才，也同樣沒有正確的政策可言，如果也竟產生了所謂『政策』，那頂多也只是一些無用的空想而已。但是，羣衆的意見、鬥爭經驗與創造，是不是就等於正確的政策呢？或者說：羣衆的意見是否就是政策呢？關於這一個問題，我想應該做些必要的引證。

斯大林同志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一書中曾說過：

『理論是世界各國工人運動底綜合經驗。當然，理論若不和革命實踐聯繫起來，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同樣，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爲指南，就會變成盲目』